

“文明復興三部曲”出版說明



當今的世界並不太平。蘇聯解體後，西方思想界曾經志得意滿，宣稱歷史已經終結，自由民主體制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後的制度，技術理性下大眾消費的現代普世文明將是人類共同的最後文明，而生活在其中的慵懶而幸福的我們將成為“最後的人”。可是，整個世界似乎並未朝著這一預想前進，動亂、仇恨、極度貧窮、體系性不公等仍在不斷上演。尤其是 2001 年的“9·11”事件後，美國對伊斯蘭世界發動反恐“新戰爭”，更宣告了美國試圖構建的“新羅馬帝國”並未得到完全服從，普世文明也從未一統天下。二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崛起勢頭正盛，美國不得不從阿富汗撤軍，集中力量對中國發起貿易戰和科技戰，並藉助新冠溯源等問題聯合盟友對中國發起“新冷戰”，這似乎意味著中國崛起也構成“新羅馬帝國”和普世文明的一大“挑戰”。面對今天的中美衝突以及後疫情時代的全球格局走向，面對中國崛起的可觀前景以及重重險阻，面對整個世界“深度全球化”的趨勢但卻並未停歇的政治角力和文明衝突，我們不禁會問，美國的一系列動作背後，到底有什麼一以貫之的理論邏輯？中美衝突背後有怎樣的哲學意義？中國文明的復興又能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提供怎樣的哲學圖景？各大文明如何才能和睦相處？全人類的共同文明理想又在何方？

正是懷著這樣的疑問，恰逢“9·11”事件二十周年，我們計劃推出強世功教授的“文明復興三部曲”，以反映一個中國學者對歐美國術界自冷戰結束以來熱烈討論的“帝國”、“歷史終結”以及“文明衝突”等諸多理論問題的學術回應。強教授學貫中西、視野宏闊，長期關注世界局勢和中國崛起，面對日益複雜的國際局勢和中國發展的歷史走向，他並非止步於作時事分析，而是指向更加恆久而深刻的歷史發展動力和人類文明未來。他的這套“文明復興三部曲”試圖突破社會科學研究中主流的主權國家視角，選擇更為廣闊的“帝國”和“文明”理論來考察人類歷史上全球權力形態

目 錄

“文明復興三部曲”出版說明



緒論	文明與帝國：如何理解我們所處的時代？	001
一、	歷史終結：人性與普遍歷史	004
二、	歷史終結：世界帝國下的政治終結	011
三、	文明衝突：世界帝國時代的政治衝突	019
四、	世界歷史的雙向運動：邁向世界帝國	027
五、	慾望社會與理性化：世界帝國的形成	035
六、	文明的終結：世界帝國與普世文明	048
七、	馬克思的幽靈們：文明的復興	060
第一章	文明的終結？恐怖主義與戰爭的法理學	067
一、	被拋棄的人道主義者	069
二、	資本主義與戰爭的法理學	074
三、	恐怖主義：戰爭與犯罪之間	090
四、	恐怖主義：雙重反抗	095
五、	美國新戰爭：宗教聖戰	106
六、	反抗與征服：文明的終結？	122
第二章	人權帝國的悖論：全球秩序中的民主轉型	133
一、	政治權威的民主衰敗	134
二、	民主轉型：國際政治的國內化	140
三、	後冷戰時代：認同政治削弱政治權威	145
四、	“顏色革命”：世界帝國的新型總體戰	150
五、	大國民主的前提：法治與政治決斷	166
六、	政治教育與責任倫理	174

的演變以及文明在其中的重要意義。他敏銳地指出，地理大發現之後，人類文明進程發生根本性轉向，全球貿易推動“世界帝國”形態興起，導致歷史上處於不同地理空間內的、曾經璀璨輝煌的多元文明帝國秩序趨於瓦解；而在文化上，一種與世界帝國秩序相匹配的普世文明隨之誕生，“歷史終結”的意識形態開始出現，普世文明與傳統文明間的“文明衝突”也初現端倪。唯有從這樣的“帝國”和“文明”的全球視角出發，我們才能理解，“冷戰”後全球秩序的實質就是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和普世文明在全球的擴張及其所遭遇的抵抗，中國崛起和文明復興就是抵抗中的一環。未來全球秩序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美之間圍繞世界帝國和文明秩序所展開的鬥爭，而中國崛起也必將帶動多元文明強勢復興，各大文明將一同邁向“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境界。

“文明復興三部曲”的第一部為《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美國建構的全球法秩序》，追溯了全球貿易發展推動世界帝國興起的過程，並以此為背景，圍繞“9·11”事件、烏克蘭選舉、碳政治以及中美貿易戰等重大事件，集中討論了美國是如何在經濟、政治和文化領域系統地展開世界帝國建構，以及這一世界帝國體系與“深度全球化”的歷史發展趨勢之間存在怎樣的根本矛盾，從而為我們理解全球格局的未來走向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第二部《大國崛起與文明復興：中國對全球法秩序的重構》，則追溯了中國“天下主義”秩序建構的歷史起源和發展，並圍繞中國崛起面臨的邊疆問題、政治發展道路和文化教育問題，從“文明復興”的角度來關注中國崛起的重大歷史意義。這剛好與第一部提出的“文明終結”問題相呼應。如果說前兩部分別集中在美國和中國問題上，那麼第三部《地理、帝國與文明：重新想像全球法秩序》則集中在“帝國”和“文明”的一般理論問題上，尤其從地緣政治入手，考察西方歷史上帝國興衰的經驗教訓及其對中國崛起的啟示。

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希望這套書的出版，能幫助讀者更深入地理解世界歷史的發展趨勢、當今中國所處的國際形勢，以及中國崛起與文明復興的歷史意義。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編輯部

2021年8月13日



第三章 「碳政治」：技術、資本與全球領導權的爭奪	177
一、後工業社會與新左翼政治：“碳政治”的起源	180
二、環境政治：歐洲與美國爭奪世界領導權	187
三、“曲棍球杆曲線”：“碳政治”的技術與政治建構	192
四、綠色能源技術：爭奪未來世界的領導權	197
五、從“碳排放權”到“碳金融”	201
六、“碳政治”主導權：從歐盟轉向美國	204
七、“碳政治”的美國戰略：對中國的挑戰	209
八、“碳政治”的中國戰略：技術創新與新興階層的政治成熟	214
九、“碳政治”的話語權較量：主權話語與普適話語的張力	219
第四章 貿易與世界帝國：中美貿易戰的深層根源	225
一、“貿易的猜忌”與“財政—軍事國家”	227
二、世界帝國的初現：“帝國強權下的自由貿易”	235
三、世界帝國的重構：“自由主義的利維坦”	245
四、世界帝國的雙軌戰略：“自由貿易”與“公平貿易”之間	259
五、應對“中國道路”的挑戰：世界帝國的戰略調整	274
六、理解中美貿易戰的五個維度	291
第五章 世界帝國的司法長臂：「長臂管轄」與「美國陷阱」	295
一、“長臂管轄”：帝國的建構與擴張	299
二、證據收集：聯邦調查局與數據帝國	309
三、“美國陷阱”：世界帝國的“法律沼澤地”	318
四、“經濟制裁”：新型的宗教裁判與開除教籍	331
五、自由法治的幻覺：重新認識世界帝國	338
第六章 世界帝國的困境：「深度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的未來	349
一、世界帝國的法秩序	354
二、“深度全球化”與世界帝國的內在矛盾	366
三、“天下一家”：超越“五四”	383
後記	387

§

21 世紀來臨之際，整個世界都在關注互聯網上的“千年蟲”問題。^[1]雖然這個小問題很快就在技術上解決了，但它似乎預示著整個 21 世紀的人類命運：在互聯網以及各種新技術的推動下，全人類的日常生活越來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幾百年來的全球化運動將人類歷史推進到“深度全球化”的新時代，這也意味著人類進入“全球風險社會”，生活在地球上的各個民族、各個國家、各種文化從此休戚與共，形成無可分割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通過全球共同關注的“千年蟲”問題，人們對互聯網技術將人類緊密連接在一起的共同生活充滿憧憬，一個技術推動的“美麗新世界”在人們的心頭展開。然而，就在新的千禧年的開端，隨之而來的是震驚世界的“9·11”事件。這兩件事情看起來沒有直接聯繫，但都涉及到一個根本問題：地球在人類的視野中越來越小，全球不同文明之間的互動越來越密切，全人類究竟應該如何共處，建構起相應的政治秩序，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2]

在這種背景下，恐怖主義往往與“千年蟲”以及全球環境和氣候問題等一樣，被看作是“全球風險社會”的一部分。然而，“9·11”事件的恐怖主義襲擊直接涉及到全球政治秩序，尤其是美國針對恐怖主義展開的“新戰爭”實際展現了美國對於如何締造全球秩序來解決全球風險的思路。那就是進一步鞏固和強化其不斷建構中的世界帝國體系，直接越過主權國家對恐怖分子展開治安清剿，對敢於支持或包庇恐怖份子的國家予以直接的軍事打擊和政權更迭，對孕育了恐怖主義的思想土壤予以文化改



造，為世界帝國奠定文化基礎。因此，世界帝國也同時是將美國政治制度和文化價值觀念推廣到全球而建立起來的“人權帝國”。^[3]

與這種世界帝國秩序相適應，“歷史終結”的政治意識形態必然出現。“歷史終結”意味著不同的地理空間和不同歷史傳統形成的多元文明格局已經終結（這就是我在後面要討論的“文明的終結”問題），所有文明都最終通向以西方文明甚至美國文明為樣板的“普世文明”。換句話說，隨著主權國家衰亡和世界帝國秩序的建立，全球不同地理空間在歷史上形成的區域性文明帝國秩序開始瓦解，甚至由此形成的主權國家體系的政治自主性也正在消亡。世界帝國必然推動歷史終結，而歷史終結也因此意味著歷史上的多元文明秩序的終結。本書取名為“文明的終結與世界帝國的建構”，就是為了強調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秩序建構實際上推動了文明的終結，用所謂的“普世文明”來取代歷史上形成的多元文明。要理解這個問題，不僅要在思想層面上回應歷史終結理論以及與此相反的文明衝突理論，更要在政治秩序層面上考察世界帝國的形成及其問題。

1 “千年蟲”問題源於 60 年代計算機存儲器的高昂成本，計算機系統的編程人員為了節省存儲空間，用兩位數字表示年份。但計算機程序中的智能系統進行跨世紀的日期運算時，兩位十進制數的運算方案會出現錯誤的結果，無法辨識公元 2000 年及其後的年份。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與存儲器價格的降低，這一技術問題很快得到解決。

2 參見本書第六章的討論。

3 參面本書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相關討論。

歷史終結：人性與普遍歷史

在世紀之交，人們普遍認為最能把握時代精神的莫過於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 1989 年發表的“歷史終結”演講。在這次演講中，他宣稱：“我們正在見證的不僅是冷戰的終結，或二戰後特定歷史階段的終結，而是歷史本身的終結：即人類意識形態演化的終結點，也就是西方自由民主作為人類最終的政體形式得以普遍化。”^[4] 在 1992 年，他將這次演講內容擴充為《歷史終結與末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即自由民主體制儘管在現實中遇到各種挑戰，但從政治哲學角度看，“自由民主的理想則已盡善盡美。”^[5] 這本著作既是後冷戰來臨之際對全球政治歷史現實的思考，也是在西方思想內部對話的產物。他要對話的或者要批判的理論，除了作為對手的馬克思主義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各種理論（如依附理論等），還有種種對自由民主主義提出批評的理論，包括兩次世界大戰以來對現代化理論及其背後進步主義內核的反思與批判。這些理論挑戰都指向一個問題：“究竟自由民主是全人類的普遍熱望，抑或他們早先的自信只不過是自己種族中心主義的反映。”^[6] 這本書試圖在政治哲學上為自由民主主義進行徹底的辯護。在福山看來，任何政府都必須面臨正當性的挑戰，而在回應一個人為什麼可以統治別人這個問題上，與共產主義、民族主義以及各種宗教神權思想相比，自由民主主義乃是人類歷史上所能夠發現的最理想的政治生活方式，因為它深深地植根於人性之中。因此，“如果我們現在無力想象一個與我們自己身處其中的世界本質上不同的世界，也找不到明確的或顯然的方



式，來表明未來世界會對我們當前秩序有一個根本的改善，那我們也就必須來考慮歷史本身可能走到了盡頭這樣的可能性。”^[7]

對於大多數中國人，哪怕是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理解“歷史終結”這個概念都有一點難度，因為在中國人思維中，歷史就是對過往發生事情的記載，只要四季在變化、時間在前移，那麼歷史就不會有終結，歷史在某種意義上是四季和自然的不斷輪回——最多“六十年一甲子”的輪回。然而，福山所說的“歷史終結”與其說是一個歷史概念，不如說是一個哲學概念。這裡所說的“歷史”，不是我們通常所理解的隨著時間推移而展開的歷史事件，而是哲學層面上思考的一個“大寫的歷史”，即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明曾經在不同的地理空間中按照自己的歷史傳統向前發展，而當地理大發現之後，西方文明崛起所推動的全球化使得這些不同地理空間中的歷史軌道連接在一起，形成彼此互動的全球歷史之時，就需要在哲學上探求一種面向全人類的“普遍歷史”（Universal History）。^[8] 也就是說，要在這種彼此分割且人種、語言、文化、信仰完全不同的複雜歷史現象背後，找到一個指引人類未來發展方向的目標或意義模式，從而“把全人類在一切時代的經驗都納入解釋範圍，並將之理解為一個唯一的、連續的、不斷進化的過程的歷史。”^[9] 換句話說，曾經不同區域中產生出來的文明所主張的普遍主義都將因此降格為“地方性知識”，在這些“地方性知識”的基礎上，何以產生出一種真正的普遍主義哲學，由此來形成對全球普遍歷史的敘述，則是這種“普遍歷史”的目標。這樣，人類歷史中的任何人、任何具體事件，唯有在這個終極目的下才可以獲得理解，而且獲得自己的終極意義。

思考“歷史終結”本身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假定歷史不是混亂的、盲目的，也不是像中國古典思想家們所理解的那樣是循環的，而是有一個指向未來的目的和終點。而這種線性時間觀念本身就是科學主義的產物，也是

4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1989)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p. 3.

5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陳高華譯：《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9 頁。

6 同上，第 29 頁。

7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陳高華譯：《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第 72 頁。

8 本書中“普遍歷史”（universal history）、“普世文明”（universal civilization）、“普適性”（universality）等概念在英文中源於同一個概念，可是在中文有不同翻譯，本文為了照顧不同中文譯本形成的概念表述，保留不同的中文概念。

9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陳高華譯：《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第 10 頁。

基督教的產物。就科學理性而言，當人類可以透過繁紛複雜的自然現象發現隱含在其背後的自然法則，從而對每一個現象給予科學理性的解釋時，人們自然也相信能找到複雜多樣的人類歷史和社會發展變化背後法則，從而對人類歷史發展及其未來走向給出科學理性的解釋。就基督教而言，上帝從創世到末日審判，奠定了一種線性時間觀念，而唯有在上帝的末日審判中，每個人以及人類歷史上發生的每一件事情才能獲得最終的存在意義。因此，關於普遍歷史及歷史終結的思考可以看作是基督教救贖歷史的世俗版本，只不過歷史取代了上帝，人類最終的哲學意義取代了上帝的末日審判而已。^[10] 可以說，在這場不同地理空間中發展出來的不同文明傳統共同參與的普遍主義爭奪中，隨著歐洲列強在地理大發現中征服全球，建立起殖民帝國體系，歐洲基督教文明也隨之在哲學思想上贏得了圍繞普遍主義展開的文明競爭，從而為其書寫普遍歷史奠定了哲學基礎，現代科學與啟蒙哲學所代表的科學理性主義也因此獲得了普適性。正是在這種普遍主義哲學的基礎上，福山認為人類歷史上關於好的生活方式的競爭終結於西方的自由民主政體。然而，如果我們意識到將自由民主政體作為歷史終結的思考來源於西方基督教文明，那麼作為歷史終結的自由民主政體，究竟是僅僅局限於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產物，還是雖然源於西方基督教文明但卻具有潛在的普遍性，從而成為一切國家或文明必須接受的歷史命運？這恰恰構成福山和他的老師亨庭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11]

關於人類普遍歷史的思考首先出現在啟蒙運動的百科全書派。伏爾泰（Voltaire）的《風俗論》、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論法的精神》和孔多塞（Condorcet）的《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等都是最初的探討。最初將全球歷史的描述上升到政治哲學思考的則是康德（Kant）。一方面，康德從哲學角度系統地將人的“自由”解釋為歷史終結點，可以說這代表了西方啟蒙哲學的最高成就，即人的“自由”取代了古典傳統中人作



為城邦動物可能具有的“神性”（這種“神性”也是其他不同文明傳統共同關注的主題），也取代了基督教神學在末日審判中獲得上帝救贖而重返上帝懷抱的終極價值，成為人之為人的最高價值。由此，歷史終結的地方就是“人的自由”得以全面實現的地方。另一方面，康德提供了人類歷史從不自由逐步邁向自由的歷史運行機制，這種歷史機制不需要藉助外力，就根植於人性之中，即人性中的競爭性和虛榮心導致人類處於戰爭狀態並因此推動歷史向前發展，不斷朝向人的自由潛能得以實現的方向邁進。由此，歷史發展是一個不斷螺旋上升的過程。這個過程在黑格爾（Hegel）哲學中獲得最全面的闡述和發展。

在黑格爾看來，人不同於動物的地方就在於人作為主體有一種尋求被他人承認的慾望，總是希望使他人承認自己擁有作為人而存在的價值和尊嚴。因此，人為了這種抽象的價值和尊嚴，可以克服動物自我保存的本能，為尋求承認而與他人展開生死搏鬥。正是在這場殊死搏鬥中，人類社會分化為主人和奴隸兩個階層，前者甘願為追求抽象價值而冒險甚至犧牲，後者則屈從於怕死本能而淪為主人的奴隸。從某種意義上，前現代封建貴族制度就是這種主奴社會關係的展現。在這樣社會結構中，主人和奴隸都未能獲得被承認的滿足，主人雖然獲得了奴隸的承認，但這是一種來自人格不完整的奴隸的承認，而非平等的主人的承認，奴隸則不可能獲得主人的承認。圍繞承認展開的主奴矛盾和鬥爭推動了歷史的發展，最終在法國大革命中獲得了完美的解決：徹底廢除主人和奴隸的區別，所有奴隸翻身解放成為主人，主人與奴隸之間不平等的承認被公民與公民之間普遍平等的相互承認所取代，這種普遍平等的相互承認就體現在現代政治的人民主權和法治這兩個政治原則之中，由此人的自由在這種自由民主國家中獲得了完美的實現，主人與奴隸圍繞被承認的慾望所展開的精神鬥爭就此終結。

正是基於對人性以及人性推動的歷史發展動力機制的理解，黑格爾全面系統地將東方中國、印度、波斯的歷史與西方希臘、羅馬、中世紀的歷史整合在一起，從而描述了一個從不自由逐漸發展到自由的人類普遍歷史：東方各民族只知道某個人是自由的（君主制），希臘羅馬世界只知道

10 [德]卡爾·洛維特著，李秋零、田薇譯：《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6 年版。

11 參見福山在書中（2006 年版本的後記）對各種批評的回應和說明。[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陳高華譯：《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第 349 頁。

某些人是自由的（貴族制），而現代西方知道所有人（即人之為人）絕對是自由的（自由民主制）。由此，人類普遍歷史就是從少數人到全人類實現自由平等的歷史，這種自由平等的絕對精神就在這種主奴辯證法的矛盾運動中逐漸展現出來。正是在邁向“絕對精神”的歷史進程中，任何思想觀念包括宗教信仰等都受制於特定的歷史、社會和文化條件的束縛，它們都不是絕對客觀的真理，而僅僅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意識形態”。人類歷史就是在不同意識形態的矛盾運動中，通過對話、比較和鬥爭，最後去偽存真，達致體現客觀真理的絕對精神：自由民主國家中人的自由平等得以全面實現。因此，“歷史終結”並不是意味著人類歷史結束了，而是意味著在哲學意義上不可能再找到比自由民主政體更能展現“絕對精神”的生活方式了。

在西方哲學史上，黑格爾之後依然有馬克思（Marx）對其理論進行發展。眾所周知，馬克思從唯物主義的角度將黑格爾哲學顛倒過來，從而發展出一個全新版本的歷史終結論。在馬克思主義看來，黑格爾的歷史終結僅僅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的產物，即將人在精神層面尋求被承認的慾望作為推動歷史的動力，而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中，人不是一個單純的形而上學的精神存在，而是一個在特定社會關係和歷史環境中的存在，主人與奴隸的矛盾不是展現在精神層面的不平等承認，而是展現在物質生產關係中的不平等佔有關係。黑格爾所關注的精神層面的主奴鬥爭不過是對物質生產關係中的主奴鬥爭的反映，而經濟基礎會決定作為上層建築的政治體制和文化精神。由此，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來源於圍繞生產資料佔有所展開的階級鬥爭。於是，黑格爾所描述的“一個人自由的君主制—少數人自由的貴族制—所有人自由平等的自由民主制”這種普遍歷史演化，就變成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演化，其歷史終結的地方乃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政體之後最終實現的共產主義社會。

從此之後，關於“歷史終結”的辯論就展現為自由主義版本與馬克思主義版本之間的辯論，展現為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之間的鬥爭。這場辯論和鬥爭直至發展為冷戰。而正是在冷戰前夕，福山宣佈這場關



於歷史終結的漫長辯論最終以自由主義的勝利和馬克思主義的失敗而告終。福山之所以敢如此高調地作出如此宣佈，不僅是因為他在政治層面看到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帶來的經濟困境以及伴隨中國改革開放和“東歐劇變”而被證實的蘇聯共產主義實踐的衰落，更重要的是他接受了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的哲學，接受了科耶夫對黑格爾哲學的重新闡釋。他認為恰恰是科耶夫重新發現了黑格爾學說的重要意義，從而將歷史終結點定位在黑格爾所定位的 1806 年：拿破崙（Napoléon）進入耶拿，將自由平等帶到整個歐洲。在科耶夫看來，從此以後的歷史不過是對 1806 年哲學的重複，是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拿破崙在法國實現的普遍革命力量在地理空間上的擴展而已。從此，歷史上再也沒有什麼新的東西，一切都是對實現自由民主理想的不斷重複而已。

如果說黑格爾從唯心主義的哲學觀念中把握到普遍歷史向前發展的內在法則，那麼從 18 世紀的孟德斯鳩和亞當·斯密（Adam Smith），到 19 世紀的孔德（Comte）、涂爾幹（Durkheim）、韋伯（Max Weber）和馬克思這樣社會理論家，一直到 20 世紀美國的現代化理論家，實際上都是從唯物主義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中不斷檢驗這種普遍歷史的發展，從而提供了人類從低級原始狀態發展到高級的現代乃至後現代的歷史經驗，而這種歷史經驗似乎也在證明人類發展不斷邁向自由平等。儘管自由民主理想在歷史經驗中不斷遭受到質疑和批判，但福山認為有必要從哲學角度對自由民主政體作為歷史終結的普遍歷史發展觀進行系統的闡述。福山的闡述並不具有理論上的原創性，但他用最簡單通俗的語言，系統地總結了西方政治哲學對人性以及基於人性對人類歷史邁向自由民主內在機制的理解。一方面，他從“經濟人”的唯物主義的視角總結了科學技術進步為自由民主政體提供的前提條件，另一方面，他從“激情的人”的唯心主義視角總結了人類尋求承認的鬥爭如何推動自由民主政體的最終實現。由此，他的理論實際上是黑格爾與馬克思兩個歷史終結版本的調和，也是對柏拉圖思想中關於人性的“慾望”與“激情”這兩種力量的調和。在此基礎上，福山完成了對自由民主政體的哲學辯護，即自由民主政體並非像馬克思主義所批評的那樣，僅僅是對私有財產的政治保護，而是來自更高的精神層面

二

歷史終結：世界帝國下的政治終結

如果說歷史終結是以對人性中的激情和慾望的馴服作為前提條件，那麼歷史終結處，人的自由與平等實際上始終處於矛盾之中。一旦賦予每個人自由，那麼由於人的自然稟賦不同，就立刻展現出不平等；而一旦以平等為前提，哪怕像共產主義學說那樣，廢除所有後天社會賦予的一切資源（尤其是私有財產和家庭）之後，依然要以犧牲自由為代價。事實上，托克維爾（Tocqueville）已經意識到，所謂人人平等的“民主的人”其實就是平庸的大眾，而他們形成的“多數暴政”必然扼殺個人自由，扼殺哲學思想和藝術的天才。君主暴政通常採取酷刑和鐵鏈，但這只能觸及到人的肉體，“多數人的暴政”採用的是語言文字的思想力量，比酷刑和鐵鏈更為持久，因為它控制人的靈魂。以至於連托克維爾也感慨道：“鐐铐和劊子手，是暴政昔日使用的野蠻工具，而在今天，文明也使本來覺得自己沒有什麼可學的專制得到了改進。”^[13]正是在這種民主暴政之下，“民主人”成為缺乏超拔高貴氣質的庸人，成為自私自利、惟利是圖、缺乏公共精神的小人，成為缺乏精神追求而追逐表面浮華、喜新厭舊的俗人，成為討好巴結他人、諂媚大眾的賤人。

托克維爾之所以對美國的民主狀況充滿嚮往，是因為美國在制度中保留了制衡民主的自由力量，即制衡大眾的精英力量。然而，只要自由導致的不平等與民主所要的平等相互抵觸，那麼這種不平等的存在就表明歷史並沒有終結。在這個意義上，將“自由民主政體”看作是歷史終結在哲學上會因為自由與平等的自相矛盾而不夠成立。而一旦要將平等原則貫徹到底，那就必須以“民主人”的標準將所有人都拉平，從而使得自由可有可無。因此，假如以人人平等作為最高的價值尺度，那麼至少在哲學理論上，共產主義

的對渴望獲取承認的追求。因此，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伴隨著冷戰的結束，成為美國以全球化的名義來推動世界帝國建設的官方意識形態。

如果從哲學的角度看，無論是黑格爾版本的歷史終結，還是馬克思版本的歷史終結，歷史不同於自然的地方就在於歷史超越了自然的必然性，為人的自由行動提供了空間。自由主義學說雖然從人性中尋找到普遍歷史推進到歷史終結的動力，然而，在主奴關係中，只有奴隸意識到主奴關係的不平等，主人意識到主奴關係的不完美，才能將主人和奴隸同時改造為追求人人自由平等的公民，而這意味著在歷史的關鍵環節中始終需要柏拉圖對人性分析中給出的最高的力量——“理性”——的引導，尤其是這種力量不斷馴服主人的激情，從而追求主人之間平等的承認。這就意味著自由民主體制始終以民主文化的培育或培養“民主人”作為前提條件。同樣，在共產主義理論中，無產階級必須接受更高的“理性”的引導，才能始終大公無私，自覺地放棄自己對整個世界的統治，在消滅階級和國家之後，最終消滅自身。這就意味著共產主義的實現必須以無產階級“先鋒隊”或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作為前提條件。然而，無論是“民主人”，還是“無產階級先鋒隊”，都表明推動歷史終結的最終力量來自比追求承認的“激情”和追求財富的“慾望”更高的“理性”引導。那是不是意味著人類歷史冥冥之中始終在“哲學王”的引導之下？如果就“歷史終結”的理想狀態而言，無論是主人對自由平等的追求，而是先鋒隊的自我犧牲意識，這種平等意識實際上都來源於基督教思想。在啟蒙哲學摧毀上帝之後，上帝始終以哲學的形式引導著人性向更為完滿的方向發展，在西方人撰寫的普遍歷史背後依然能夠看到救贖神學的影子，以至於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被看作是“福音書”。^[12]



12 參見〔法〕德里達著，何一譯：《馬克思的幽靈：債務國家、哀悼活動和新國際》，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6 年版。

13 〔法〕托克維爾著，董果良譯：《論美國的民主》，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9 年版，第 293 頁。

法律規則和技術規則為“用”，積極建構全球治理的新科學。

第三，紀念“五四”更應當超越“五四”，以更大的自信來復興“天下一家”、“天下大同”的全球治理理念。當年“五四”運動採取了激烈的反傳統立場，拋棄了中國古老的天下傳統，致力於將中國建構為一個主權國家，從而加入到全球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這個任務終於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際完成了，並在後來恢復了在聯合國中的常任理事國身份。新中國在聯合國中團結一切進步力量，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始終致力於反對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全球繁榮。而今天，隨著中國崛起並積極參與到全球治理中，我們需要以更大的“文化自信”來激活中國古典的天下主義傳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奮鬥，積累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並邁向強起來的歷史經驗，因此中國有責任推動後發達國家探索符合自己歷史文化傳統的現代化道路，共同反對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這就意味著，中國古典的天下主義必須和西方思想中的世界主義傳統和共產主義傳統相互促進，共同探索反對世界帝國體系、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所面臨的各種理論難題。面對“深度全球化”的歷史趨勢，中國人應當秉持“天下一家”的古老信仰，堅持“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西方人的天下，更不是美國人的天下的信念。世界上每個國家、每個文明都有探索自己發展道路的權利，發展道路的多樣性植根於文明的多樣性。中國人民應當與世界人民一道，共建“天下一家”，共享“天下大同”。



後 記

2001年“9·11”事件無疑是改變人類歷史命運的大事件。那時，我正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訪學，親身感受到這個事件對美國帶來的衝擊。由此，我在自己專業研究之餘，開始關注全球大變局以及人類未來的命運，並思考中國崛起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二十年間，我針對一些對全球秩序產生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撰寫了一系列學術評論。收入本書的六篇評論就試圖追溯美國建構世界帝國的歷史起源以及美國建構世界帝國的技藝。世界帝國的建構源於地理大發現以來全球貿易網絡的形成，但這個問題直到後冷戰時期，尤其是“9·11”之後美國公開用世界帝國體制來取代聯合國體制，在全球展開以治安清剿為目的的各類戰爭，才使得學者們關注到美國正在建構的“新羅馬帝國”。雖然從科索沃戰爭開始，已經引發了相關爭論，但西方學界真正系統地對美國作為帝國展開研究和辯論，主要還是以“9·11”事件以及由此而來的反恐戰爭為起點。

本書第一篇關注2001年“9·11”事件引發美國發起反恐的“新戰爭”。這次戰爭作為構建“新羅馬帝國”的開端引發了諸多問題，不僅是戰爭法則的改變，更重要的是文明衝突背景下的“新十字軍東征”，以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與資本主義現代性文明的內在衝突。這些問題無疑是理解現代政治及其塑造的全球帝國秩序的關鍵。這篇評論是在2001年與朋友們圍繞“9·11”事件展開辯論時寫作的，當時並沒有單獨發表，後來收入《立法者的法理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中。在今天中美陷入貿易戰並因新冠疫情而衝突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再讀二十年前的文章，發現其中的很多觀察和思考今天依然成立，甚至在今天讀來更為貼切，畢竟當時大多數人對美國締造的新世界抱有幻想和期待。我自己後來的很多思考都已出現在這篇評論中。因此，這次收錄本書，我只對其中不連貫的地方做稍許擴充，並補充了後來美國反恐戰爭中的相關問題，

從而使其內在邏輯更為完整。

本書第二篇討論的是 2004 年烏克蘭大選。這篇評論最初以《民主化轉型中的憲政權威》的訪談連載於《21 世紀經濟報道》（2004 年 12 月 9 日和 15 日）。這篇訪談引發學界的爭議，並被看作是我思想轉向的標誌。這在相當程度上是由於大多數人對民主的理解僅僅局限於主權國家內部的政治視角，而未能從全球地緣政治、世界帝國建構的角度來思考美國在全球推行“顏色革命”的目的其實是建構“人權帝國”。當然，對不少人而言，推動民主並成為世界帝國的臣民乃是無上榮耀。後來每次烏克蘭大選都引發爭議，媒體上也會推出這篇訪談。2014 年的烏克蘭選舉引發克里米亞脫離烏克蘭、併入俄羅斯，由此引發俄羅斯與西方地緣政治衝突的所謂“第二次冷戰”。蘇聯解體之後，烏克蘭曾擁有強大的核武器和高端工業製造能力，又有良好的農業基礎。假如烏克蘭在地緣政治的夾縫中處置得當，會成為一個能夠平衡東西方的重要力量。然而，這個國家未能產生出體現其國家利益和國家意志的領導層，以致在西方推動民主化的致命誘惑中喪失了政治獨立性，企圖成為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的一部分而引發地緣政治危機。如果說 2004 年寫這篇訪談是出於對國內政治輿論氛圍的憂慮，那麼 2019 年喜劇演員當選烏克蘭總統之後，國人對烏克蘭選舉已沒有什麼興趣，由此足以看到國人的政治成熟。“一頁歷史勝過萬卷邏輯”。一個民族唯有從歷史中不斷獲得教益才能走向政治成熟。這篇訪談後來收入我的《超越法學的視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一書中。這次收入本書，為了保持體例統一，將訪談修改為評論並做了適當的內容擴充，以便將相關道理講得更清楚一些。

本書第三篇討論的是 2009 年哥本哈根會議討論的全球“碳排放”問題。這個問題在全球和國內都曾經引起巨大的反響，很長時間一直是公共輿論關注的焦點。這篇文章源於 2009 年參加“氣候政治與新帝國主義”的研討會，曾以“碳政治：大國格局下的戰略抉擇”為題刊發於《中國經濟》（2009 年第 9 期），其後刪節版以“‘碳政治’與中國的戰略抉擇”為題發表在《解放日報》（2009 年 12 月 27 日），並在網絡上轉發。在當時的輿論背景下，環境問題作為一個道德問題對中國的發展模式構成靈魂上



的拷問。這篇文章試圖將這個道德問題還原為政治問題，從而展現圍繞碳排放而展開的全球利益博弈。如果和第四章所提到的貿易與環境的問題聯繫在一起思考，則更能理解這個問題的世界帝國背景。後來，我又在“中國文化論壇”舉辦的通識教育暑期班上圍繞吉登斯的《氣候變化的政治》講了這個問題，對相關的問題做了相應的修改和補充。如今，國人皆已意識到氣候變化的碳排放問題不是簡單的環境問題，而是與科技產業和經濟發展乃至民生改善息息相關的問題，同樣也意識到西方形形色色的環保組織乃至政黨往往是跨國科技巨頭們背後支持的利益代言人。

本書第四章圍繞美國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戰展開，討論全球貿易如何推動世界帝國的建立，以及世界帝國從萌芽狀態的大英帝國版本向全面發展的美利堅帝國版本轉型，從而將中美競爭看作是由貿易推動的世界帝國不斷向前演化和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唯有從這個角度，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中美之間的競爭不僅關乎貿易和科技產業，而且涉及到政治和文化意識形態，而歸根結底就是中國崛起對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秩序構成了挑戰。2018 年中美貿易戰爆發之後，我圍繞這個問題撰寫了近十萬字的內容，其中只有小部分修改發表。曾發表於《超越陷阱：從中美貿易摩擦說起》（當代世界出版社，2000 年）的《世界帝國的戰略轉型與中美“貿易戰”》就是其中的開篇。然而，要講清楚全球貿易與世界帝國的關係，不得不追溯更為早期的歷史。因此，這篇文章在收入本書的時候，做了大幅度的內容擴充，其中前四節都是新增加的內容。只有追溯世界帝國起源的漫長歷史，我們才能將中美貿易戰放在世界帝國的框架中加以理解。

本書第五章討論的是 2018 年美國對中興通訊的制裁和加拿大扣押孟晚舟所體現的美國司法“長臂管轄”問題。事件爆發後，我們第一時間組織翻譯出版了《美國陷阱》（中信出版社，2019 年）和《隱秘戰爭：美國長臂管轄如何成為經濟戰的新武器》（中信出版社，2019 年）兩書。然而，如果查閱中文文獻，就會發現國內學者對“長臂管轄”的研究非常薄弱，甚至在法學界很多人也是第一次聽說這個概念。這足以看出我們對美國法律的研究集中在其國內法律治理問題上，很少有人從世界帝國的角度來研究其建構世界帝國的法律技藝。為此，我撰寫了《帝國的司法長臂》

(《文化縱橫》，2019年第4期)和《〈美國陷阱〉揭露了一個駭人聽聞的霸凌主義案例》(《求是》，2019年12期)，介紹“長臂管轄”以及由此設置的美國“司法陷阱”。原文比較長，刊出時由於篇幅限制，刪節了不少內容。這次，我將兩篇文章的內容整合起來，又對相關問題作了進一步的拓展。

本書第六章是我在2020年5月4日北京大學舉辦的“疫情重襲後的全球治理”理論研討會上的發言。這次刊出時在全文框架和主旨不變的前提下進行了內容的充實。從某種意義上，這一章也可以看作是對全書內容的一個小結。

為了對全書的內容做一個相對系統的總結，完成全書修訂之後又撰寫了緒論，試圖澄清書名中所提到的“文明終結”和“世界帝國”這個概念，並回應美國學術界在後冷戰以來世界帝國建構中的“歷史終結”和“文明衝突”這兩種意識形態。本書試圖使用世界歷史的“雙向運動”這一概念，將這兩種意識形態放在世界帝國形成、發展和演化的漫長歷史中加以理解，從而為理解全球秩序的未來提供一個理論解釋框架。

從2001年以來的這二十年間，我雖然未能集中精力來研究美國，但對美國的關注始終是我閱讀和研究的重點之一，並藉助對美國問題的觀察來思考中國問題，研究美國憲法以關注中國憲法，研究美國的世界帝國建構以關注中國崛起面臨的難題。其中，對美國憲法和中國憲法的研究，部分內容已結集出版(《立法者的法理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而關於美國對世界帝國的建構以及中國崛起的有關思考，也會陸續整理出版，本書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文章都是針對時勢的憂心之作。回過頭來看，中國從每個重大事件中走過來可謂是步步驚心。“9·11”事件爆發後，各方面都急需關於美國戰略決策和中美關係走向的判斷，我從文明衝突和地緣政治的視角強調，中美關係會因美國反恐新戰爭而有所緩和，但美國進入阿富汗、中亞之後，中國西部邊疆將會面臨危機。大多數人意識到前者，但很少有人關注後者。直到新疆爆發一系列恐怖主義事件後，我們才發現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三股勢力在新疆滲透之深，非經痛苦

的刮骨療毒難以痊癒。今年美國策動西方世界就新疆棉花問題發起對華經濟制裁，不過是對二十年前借“9·11”事件佈局中國西部邊疆的歷史迴響。而2004年時，烏克蘭“顏色革命”引發國內輿論的民主狂歡，那時互聯網剛剛普及，網絡輿論散發著“顏色革命”的氣息。正是面對這樣的政治環境，我才在上述訪談的最後特別強調韋伯所說的政治家的“政治本能”。2009年的碳排放問題，在西方輿論的推動和影響下，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正當性面臨著“穹頂之下”的巨大壓力，迫使溫文爾雅的丁仲禮院士發出“中國人是不是人”的質問。至於2018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戰，直到今天我們依然處在它的巨大壓力下。可以說，這些發生於不同時間、分散在不同領域中的重大歷史事件，唯有從世界帝國的視角看，才能獲得完整的理解，也唯有在“文明終結”和“世界帝國”的理論框架下，我們也才能理解中美競爭的本質及其未來走向。

正是面對時勢的緊迫性，這些文章都以評論的方式來寫，而沒有寫成四平八穩的專業學術論文，既沒有添加豐富博學的註釋，也沒有展現細緻繁密的論證，所預設的讀者也不是專業小圈子中的同行，而是更大範圍裡的同道。這次修訂出版依然保留評論的風貌。由於寫作時間跨度大，本次修訂既想保留刊出時的原貌，也要增加新的內容，前後內容難免有所重複或不夠連貫，希望以後有機會再次修訂時能夠彌補這些缺憾。本書的內容是按照寫作的時間順序來排列的，但如果從世界帝國的內在邏輯看，先讀第四章或許更有助於形成一個全域性的思考框架。

如果從2001年7月的“上海會議”算起，至今剛好二十年了。這二十年來的閱讀、思考、研究和對話，無不是為了回應這次會議提出的問題，即如何思考中國文明在整個世界中的命運。這個思考有一個巨大的歷史背景，那就是中國要面對和克服的是地理大發現以來西方崛起所塑造的世界帝國體系。因此，認識世界帝國的概念、研究世界帝國的技藝、思考世界帝國的命運，無疑成為認識中國文明、思考中國命運的立足點。在某種意義上，這套“文明復興三部曲”的思考實際上既是對這次會議的紀念，也是與參加“上海會議”的師友們的持續對話，對於他們的感激已不需要在此一點名致謝了。



從關注美國憲法中的領土問題到追溯香港問題的帝國起源，帝國與文明問題逐漸成為我這二十年中思考和研究的中心話題之一。尤其 2008 年從香港返歸北京大學之後，我們通過開設研討課程、舉辦學術會議和暑期班、翻譯學術叢書、撰寫學術文章和畢業論文，來共同推動對帝國問題的研究。其中章永樂、殷之光、魏磊傑、孔元、傅正、劉天嬌、孫璐璐、李柯、葉蕤、吳啟余、史慶和王顯寧等年輕學者在這個領域有很好的研究，我要感謝他們在討論中對我的啟發和激勵，尤其感謝這幾年與章永樂、孔元和傅正在一起開設的《法學經典著作選讀》課程上與同學們的共同閱讀和討論。同時我還要感謝季紅、楊平、陶慶梅、張翔、劉海光和蘇健偉等朋友，在他們的不斷督促下，我才完成了這些文字。還要感謝朵悅同學和秦測皓同學幫我處理相關注釋。

最後，我要感謝愛人孫麗馨，是她的溫暖滋養著我們全家人，不僅使我能心無旁騖地思考這些永遠沒有答案的問題，更能緩減我面對時勢的憂心和焦慮。

2021 年 8 月 7 日
於陝北上郡仁和居

